



古崇宁县，即今成都市郫都区唐昌镇，地处成都平原西北部，自然环境优越，位于成都郫都区、都江堰、彭州三地交界处，区位优势十分显著。在川西坝子上，流传着成都郊区“温郫崇新灌”之说，五个地方各具特色，属于都江堰灌区的核心区域，农业发达，经济持续兴盛，百姓殷实富足。其中，“崇”是指崇宁县，而非崇庆县（今成都崇州市）。崇宁县历史悠久，古称唐昌县，距今已有1300余年的建置史。在唐代，曾因交易繁盛“唐昌草市”而闻名一时，得益于丰富的物产和便利的水运，崇宁县成为川西商贸重镇。明清时期，崇宁县为成都府辖地，是府属三州十三县之一。



成都市郫都区唐昌镇文庙。(资料图片)

一朝唐昌，千年崇宁

□杨立

壹

地名记：始建于唐朝的古县

与成都府诸州县比，崇宁县的建置时间较晚，属于“年轻”的千年古县。崇宁县的前身为唐昌县，同邛州（今成都邛崃市）大邑县一样，始建于唐代。由于地理位置重要，政治象征显著，唐昌县于唐仪凤二年（677年）正式设置。唐《元和郡县图志》有记：（唐昌）本郫县、导江、九陇三县之地，仪凤二年于此分置唐昌县。

唐昌之名带有强烈的政治和军事象征，意为“大唐昌盛”。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希望国家政权稳固、长治久安，如在汉代，全国就存在汉嘉、汉寿、汉兴等县名，大唐亦如此。武则天改国号周，于长寿二年（693年）改唐昌为周昌；唐中宗即位后，神龙初年复名为唐昌。北宋开宝四年（971年），唐昌曾改名为永昌，又于徽宗崇宁元年（1102年）更名为崇宁县，成为又一座以皇帝年号命名的城市。热衷于文艺的宋徽宗一共使用过几个年号，分别是建中靖国、崇宁、大观、政和、重和，以及宣和。年号崇宁（1102-1106）用了五年，取继承熙宁变法之意。改元大观以后，标志作为年号的“崇宁”使命结束，而作为地名的“崇宁”则延续下来，使用了将近850年。明清时期，崇宁县作为成都府属县而存在。

长久以来，崇宁县与郫县的关系十分密切，地域相近、民俗相通、往来频繁。清康熙七年（1668年）曾并崇宁县入郫县，雍正七年（1729年）又分置崇宁县。到了1958年，崇宁县被撤销，其地并入郫县，其城降为镇，其地复名为唐昌。在崇宁县被撤销之前，共辖一镇十乡，分别为唐昌镇，以及君平乡、唐昌乡、元觉乡、灵圣乡、安德乡、竹瓦乡、万寿乡、丰乐乡、桂花乡、庆兴乡，其辖地的大部分划归郫县管辖，少部分划归彭县（今成都彭州市）管辖。

贰

历史记：朱元璋孙子的封地

人们都说金温江、银郫县，那崇宁县的特点是什么呢？答曰：贵。可以理解为尊贵之“贵”，也可以理解为富贵之“贵”。崇宁县之“贵”主要在于政治地位，是因为他与明代宗室密切相关。

明初，朱元璋通过宗室子孙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和监督，并于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前后三次分封诸王，分镇全国各地，形成了“藩屏帝室”的诸王分封制度。洪武十一年（1378年），朱元璋将年仅七岁的第十一皇子朱椿册封为蜀王。朱椿于洪武二十三年（1390年）就藩四川成都府，成为蜀府第一代藩王。据史料记载，朱椿有6个儿子，朱悦燁为庶出第三子，按明朝分封制度：诸子年十岁，则授涂金银册银宝，封为郡王。

永乐二年（1404年），朱悦燁被朱棣封为郡王，其封邑在崇宁县，故称崇宁王。从此，崇宁县便作为朱悦燁的封地，或多或少沾染了高贵的皇家气息。可好景不长，朱悦燁于永乐十六年（1418年）去世，享年二十六岁，由于没有留下子嗣，崇宁王一脉戛然而止。据传，由于崇宁县是郡王封地，其县城的构造也与其他普通的县城不同，在城墙上“加冠戴帽”的特征，在街道上有“对正不偏斜”的布局，以体现皇家贵气和王者大气。在崇宁县城，还有歇马亭、御马营、御井等古迹，街坊间仿佛还流传着小王爷的故事。朱悦燁死后，葬于崇宁县北十里朝天山，县志上称之为明崇宁王墓。

叁

城池记：百姓捐修的城池

元代统治者重视都城建设，但不大重视普通州县的建设，为了防止人民反抗，甚至还禁止天下修葺城市。纵观成都平原上的县城，大多筑城于明代，而崇宁县却筑城于元朝末年。清嘉庆《崇宁县志》有记载：旧系土城，旧志载元末赤鲁不花始建城垣。赤鲁不花，推测其时任崇宁县知县。

明正德年间，崇宁县又增修了城墙，疏通了城濠，城墙高一丈一尺，周长为三里三分，共计五百九十四丈。经历明清战火后，城池一片废墟。清雍正七年，官方复设崇宁县，地方官绅共同对城池进行了补修。清乾隆三十年（1765年），知县陈新槐奉命增修，将土城升级为砖城，城墙高一丈六尺九寸，周长八百七十九丈，并添置七座炮台，共计四里八分八厘三毫。全城共设五门，建了四座城门楼，东门叫朝阳、南门叫南薰、小南门叫观圣、西门叫西成、北门叫拱极。小南门之所以叫观圣，是因为小南门之内的小南街，正对文庙，以表崇儒尊孔。

关于乾隆年间县城的修筑，当地士绅百姓深明大义，积极支持踊跃捐资，在没有动用国库资金的前提下，完成了这项浩大工程，为国家减轻了负担修城工费高达一万六千四百七十四两白银。万两白银是什么概念呢？于普通人而言，可以说是天文数字。关于清代普通百姓的收入情况，学者张仲礼在其《中国士绅的收入》中提到：一个乡村或城市的劳动者除雇主提供的伙食外一年的平均收入只有5-10两白银。对于一座人口不多、面积不大的小县城崇宁而言，修城耗资不可谓不巨大。

肆

民风记：善良的方氏家族

崇宁县文庙位于县城西北，是崇宁县的文化和教育中心。在清嘉庆年间，

文庙里的泮池和官墙被培修一新，这项工程颇费心力，与一位叫方善勳的读书人有关。在嘉庆版《崇宁县志》中，人物一卷专门记载了声名远播的地方名人。根据笔者统计，共有二十七位，方善勳因善举也位列其中，足见其非同一般，确为万里挑一。这二十七人中，姓方的共有三位，除了方善勳，另外两位叫方仁世和方明秀。经志书介绍才知道，原来他们是一家人，方仁世是方明秀的父亲，方明秀是方善勳的生父，祖孙三人同载于方志，何其特别又何其荣耀。他们的故事值得挖掘，他们的家风更值得发扬。

方仁世是方善勳的爷爷，本是湖南人，早年跟随父亲来到崇宁，在此成家立业，几经奋斗略有家产。方仁世对父母十分孝顺、对兄弟十分友爱。方仁世生性善良，凡族人或邻居遇到急事，都会去接济，如帮助其他父子相聚，帮助其他夫妇团圆。遇到无力安葬亲人的家庭，就布施棺木；遇到河溪没有桥梁，就捐资修建。为了表彰方仁世的种种善举，时任县令陈新槐还赠予他家一块“急公和义”的匾额。县志云：（方仁世）年七十五岁至今，家道丰盛，子孙蕃衍，功名不替，人以为仁厚之报。

他的儿子方明秀继承了优良的家风，晴耕雨读、孝友叔弟。因为其堂弟方明理、方明扬早逝，方明秀就帮助供养他们的儿女直至长大成人。方明秀的胞弟方明河去世后，由于胞弟没有子嗣，所以方明秀将亲儿子方善勳过继给他，让胞弟家后继有人；方明秀还培养儿子方善宗成才，父子俩后来都考中秀才，进入崇宁县学学习。

而方善勳自小便苦读诗书，最终不负众望，通过童试，也考取了秀才。在方家纯正家风的熏陶下，方善勳始终为人宽厚，崇尚仁义。在嘉庆十七年（1812年），他同生父方明秀共同捐资六百两白银，重新培修了文庙中泮池。泮池作为文庙中重要的建筑，位于大成门正前方，为一半月形水池，意即“泮宫之池”，是官学的标志。时任县令刘坛在其《重修泮池碑记中》详细记录了修泮一事：方生善勳素勇于义，慨然曰：生能独立办此，勿以烦君子也，于是引以为己任，择吉开整。善不图报，善有回响，四川学政赵佩湘为其题写了“勤勤义举”的匾额，知县刘坛为其题写了“香名留泮”的匾额，崇宁县儒学教谕车富华为其题写了“继志”的匾额。

方善勳确实继承了先志，诚如清代姚文田所撰对联：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，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。崇宁县文庙保存至今，泮池古朴依旧，一砖一石之间，隐约浮现出一百多年

前，方家前后三位秀才游泮时的热闹景象。他们的善心，他们的仁义，他们的家风，已经留存于崇宁历史上，永不磨灭。

伍

名胜记：崇宁八景

崇宁县地势以平原为主，仅有县境西北分布了小部分丘陵，大部地域一马平川。来自都江堰离堆内江分流而下的蒲阳河、柏条河、走马河等流经县境。县无名山，仅有西北大山之余脉；亦无大川，却有岷江水系之奔腾。

崇宁县虽小，却远可望西边的山岳，近可观东流之溪河，成型于清嘉庆年间的崇宁八景，多取于县城内外的山水形胜。这八景为：赏官古桂、御井梅花、月照泉塘、灵宝流沙、清江夜渡、风洞烟霞、竹林夜雨和晓寺闻钟。

八景之中，水是重要的造景意象。由于崇宁县地处都江堰灌区的核心区域，水资源十分丰富，与水有关的景观占了三处，包括月照泉塘、灵宝流沙、清江夜渡，充满浓郁的诗情画意。赏官古桂、御井梅花、晓寺闻钟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特色，三处都位于县城之内。御井梅花是一处与崇宁王有关的名胜，至今犹存。关于此景，清嘉庆间崇宁县知县刘坛为其作诗一首，为后人留下了古井的回忆，诗曰：

石瓮澄寒碧，梅开顷刻花。
不须春点缀，如见水横斜。
绘出仙源路，水来处士家。
暗香闻仿佛，手汲试烹茶。

根据20世纪80年代《郫县志》所载，井址在原崇宁县城近小南门小南街的居民宅中。据传此井原为朱悦燁受封于崇宁县时，修于王府中的水井。井口用石板砌成梅花形状，其轮廓映入井底，宛如一朵梅花，所以被称为“御井梅花”。若至月夜之时，俯身探井，则可见井底之中梅影浮现。为了映衬此井，人们还在井畔栽了数株梅花。后来，由于井口石板破烂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人们将井台加高，并用水泥将井口砌为方形，留存历史上和古诗中的“御井梅花”不复再见。

时至今日，崇宁县已经消失于岁月中，唯有唐昌镇赓续着悠悠古韵。现在，作为历史文化名镇的唐昌，得到了妥善保护和发展，大体保留着崇宁县旧时的格局，造型特别的城墙、古朴庄严的文庙、依旧热闹的街巷、幽雅清静的园林，无不彰显着古县的气质与魅力。崇宁的街头巷尾，汉代学者严君平卜筮、宋代高僧圆悟禅师讲经、明代郡王朱悦燁留驾等传奇故事，经久不息地流传着。

此地，一朝唐昌；此名，千年崇宁。